

周恩来总理与 杭州灵隐寺



滕建明 杨鉴非 著

西泠印社 出版社

周恩来总理与 杭州灵隐寺

滕建明 杨鉴非 著



西泠印社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恩来总理与杭州灵隐寺/滕建明,杨鉴非著. —
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1.4

ISBN 978-7-5508-0065-6

I. ①周… II. ①滕…②杨… III. ①周恩来(
1898~1976)——生平事迹②佛教——寺庙——文物保护——史料——
杭州市 IV. ① K827=7② B947.25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55562 号

周恩来总理与杭州灵隐寺

滕建明 杨鉴非 著

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市西湖文化广场 32 号 5 楼(邮政编码: 310009)

责任编辑: 杨 舟

责任出版: 李 兵

封面题签: 薛 驹

封面设计: 王 欣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杭州正之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2.75

印数: 5000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08-0065-6

定价: 30.00 元



XUYAN

叙 言

杭州灵隐寺是中国佛教名刹,有关开国总理周恩来生前对灵隐寺的重视和保护,已有不少记述和回忆。本书作者之一的杨鉴非同志是宗教管理部门的老同志,早年在浙江省委统战部从事宗教管理工作,曾经见证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杭州市灵隐寺大雄宝殿的修复工程;“文革”后到杭州市委统战部宗教处工作,一直到离休,对灵隐寺在“文革”中的境遇亦多有听闻。1988年离休以后,他很想写一点有关灵隐寺的文字,以期在保存灵隐寺历史真实的工作中,发挥绵薄的作用。这就是我们撰写并于1992年出版的《灵隐轶话》一书的缘由。不曾想到的是,因为书中写到了“文革”初期周恩来总理指示保护灵隐寺一事,而引来一场关于此事真实性的的大争论。为了查实求证此事,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取得了包括当时浙江省委领导、周总理身边工作人员在内的一些当事人的回忆资料,终于使周总理指示保护灵隐寺的历史真实得以还原。

在整理有关周总理在“文革”初期指示保护灵隐寺的资料时,我们发现:周总理对灵隐寺的了解,远远超过我们的认知,他甚至掌握一些一般人都不知道或者不注意的灵隐寺的细节。他一直把灵隐寺作为一个重要的佛教胜地、著名的旅游景点,一个展示新中国宗教政策的窗口,联络国际佛教友好国家和团结佛教信徒的纽带。正是基于这样深度的认识,当解放初期灵隐寺大雄宝殿倾毁后,他很快同意拨款修复;在“文革”初期灵隐寺遭到红卫兵冲击时,他及时作出指示予以保护。回头看周总理在“文革”初期指示保

护灵隐寺的举动，并不是在下级报告情况时，作为一般上级领导那种公事公办的简单指示，而是源于他对灵隐寺一贯的了解和重视。如果我们能将解放后到“文革”中，周总理一直关注和保护灵隐寺的历史真实互为观照，诉诸于媒体，就能让读者了解到：作为一个大国的总理，是如何认真贯彻着党和国家制定的正确的宗教政策，在灵隐寺的修复和存毁关头表现了怎样的睿智和冷静。从而对周总理的思想高度、文化涵养和崇高人格有更深入的理解，对我们党的宗教政策也会有更为全面的认识。

此外，关于“文革”初期周恩来总理指示保护灵隐寺一事的具体过程，当今媒体有杂说纷纭之象。我们觉得有必要将亲历此事的当时浙江省委领导和周总理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资料予以公开，以求得史实的廓清，从而避免在叙述此事时做无为的想象和猜测。

写史难，写现代史更难。除了写现代史会涉及当事人，而容易遭致诘责外，我们在爬梳资料时感到为难的还有：现代历史事件尽管近在咫尺，但因为不同的当事人所处的地位、角度、时段，和对事件本身感知的不同，他们就同一事件的记忆和回顾，很难做到完全准确和吻合。第一手资料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更不用说二手或者几手的材料了。因此，比对各种资料，进行一定的分析后对史实作出抉择，是一项相当辛苦且不容易做到完满的工作。严格说来，我们只能逐渐逼近史实本身，而永远无法真切全貌地展现它。

但是这种逼近史实的工作，也相当有意义。在这个过程中，至少我们将《灵隐轶话》以及其后自己一些文章的不甚准确的说法和表述，做了进一步的修订。不过尽管如此，我们仍不会认为自己的工作已经完美。因此，我们的这些文字连缀，有待于专家和事件亲历者更多的补充和完善。

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原中共浙江省委书记薛驹同志。他在“文革”初期担任浙江省委副秘书长，是周恩来总理指示保护灵隐寺全程的亲历者，也是贯彻落实总理指示的执行人之一。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他不顾年迈，仔细阅读了本书，并慎重题写了书名。老同



志对历史真实的重视和负责，应当成为我们学习和研究现当代史的楷模。

作 者

二〇一〇年四月五日

CONTENTS

目 录

叙言 / 1

周恩来总理与灵隐寺的重修 / 1

- 一、灵隐寺与杭州 / 1
- 二、重修大雄宝殿 / 8
- 三、几段插曲 / 12
- 四、古刹焕发青春 / 16
- 五、国际友好往来 / 18
- 六、发挥佛教名人的作用 / 26

周恩来总理与“文革”初期的“灵隐寺事件” / 32

- 一、周总理指示保护灵隐寺史实查证始末 / 32
 - (一)《灵隐轶话》的写作 / 33
 - (二)周总理指示保护灵隐寺一说遭到质疑 / 35
 - (三)寻访历史真相 / 36
 - (四)真情的回忆 / 39
 - (五)周总理给红卫兵组织的电报 / 43
 - (六)还历史真相 / 45
 - (七)极其精彩的补充 / 45
 - (八)几个细节的甄别 / 48
 - (九)伟大的理性之光 / 50
- 二、周总理保护灵隐寺指示下达的时段问题 / 53
- 三、灵隐寺事件叙略 / 62

影印附页 / 69

- 一、时任浙江省委办公厅副主任萧贻同志的回忆资料 / 69
- 二、时任浙江省委副秘书长薛驹同志的回忆资料 / 70
- 三、时任浙江省委宣传部长陈冰同志的回忆资料 / 72
- 四、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童小鹏同志的回忆资料 / 74
- 五、时任周总理值班室负责人周家鼎同志的回忆资料 / 75
- 六、杭州市电信局退休职工袁镜泉的回忆文章 / 77
- 七、杭州市电信局退休职工韩学林的证明资料 / 78

周恩来总理与灵隐寺的重修



一、灵隐寺与杭州

灵隐寺是杭州市最大的佛教丛林，我国江南地区重要的佛教寺院之一，也是著名的杭州西湖风景区的重要组成部分。1949年7月的一天，一声轰隆巨响，灵隐寺的大雄宝殿倒塌了。

此前，灵隐寺大殿最后一次整修是在清宣统二年（1910年）。清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入杭州，灵隐寺大多寺宇被毁。法镜寺僧贯通住持灵隐寺，开始重修联灯阁、大寮、库房。贯通圆寂后，继任住持昔征和尚在大实业家盛宣怀的护持下，于宣统二年重修灵隐寺大雄宝殿和大悲阁。大殿高十三丈五尺，所用木料是清廷为整修颐和园而专门从美洲购买的，因革命浪潮涌动，时局动荡，颐和园整修无法按计划进行，于是将木料运到杭州，用于修建灵隐寺大殿。却非住持时，又重修了翠微亭、春淙亭和天王殿，灵隐寺一度展换新颜。1936年，灵隐寺失火，烧毁木质罗汉堂。第二年日本侵略军进杭州，难民涌入灵隐寺，红十字会在灵隐寺设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五六百人，管理不易。难民夜半用火不慎，失火致寺内客堂、伽蓝殿、焚香阁和东山门被毁。解放前夕，灵隐寺一片冷落。到1949年，在1910年整修后历经了39年的大雄宝殿，由于年久失修，受潮腐朽，白蚁蛀吃，梁柱已无力支撑，被蛀空的长达28公尺的大梁终于折断倒塌下来，砸毁了三座佛像，灵隐寺至此基本残破。为防止殿塌伤人，灵隐寺关闭了大雄宝殿。

灵隐寺与杭州市有着非常特殊的联系。

公元3世纪前后的两晋时期，佛教在中国获得极大发展，官方和民间的佛教信仰日趋普及，来自印度区域的僧人传教活动也逐

渐增多。东晋咸和元年(公元326年),西印度僧人慧理来中国,初驻杭州,见城西山岩秀丽,赞叹道:“此天竺灵鹫峰一小岭,不知何代飞来?佛在世日,多为仙灵所隐。”灵隐和飞来峰因而得名。慧理在此先后建寺五座,因毁废或者更迭,其他四寺已不存,一直传承至今的就是灵隐寺。

灵隐寺从开创到声誉日隆,其所处地理环境是一个重要条件。灵隐寺坐落在杭州西湖西端的群山中,此地旧时统称虎林山(唐时避讳而改称武林山),以海拔300余米的北高峰为群峰之首,峰峦连绵,古木参天,泉流交错,气象幽深。灵隐寺背倚伟岸雄峻,树林茂密的北高峰为座山,面对被徐霞客描绘为“峰尽露骨,石皆嵌空玲珑”的飞来峰为案山,中夹一道淙淙流淌的冷泉溪水,简直就是一个天然的森林公园。这样的环境,不仅是佛教徒避世修行的极好选择,也是普通游客难得的旅游佳境。诚如白居易在《冷泉亭记》中所言:“东南山水,余杭为最。就郡言,灵隐寺为最。”自古以来,众多的文人墨客为灵隐山水留下过无数的赞叹:“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宋之问《灵隐寺》),“古松攀龙蛇,怪石坐牛羊”(苏轼《北高峰》),“泓澄冷泉色,写我清旷心。飘遥白猿声,答我雅正吟”(林逋《灵隐寺》),“小桥不断横溪路,古寺又闻隔树钟”(张瀚《灵隐寺》)等,都是其中的名篇华章。就与城市的距离而言,灵隐寺与杭州市区仅有一个西湖之隔,而西湖本身就是绝佳的旅游景点,与灵隐山水相得益彰。在杭州一地逐渐成为我国东南地区重要的政



北高峰远眺

灵隐寺背倚北高峰。在杭州诸山中,北高峰为最高峰。



治经济区域以后,灵隐寺这种礼佛、旅游兼宜的地理条件优越性,就日益显现出来。从这个角度来说,当初慧理选择此处开山建寺,的确有独到的眼光。

寺院的繁盛,有赖于其在佛教传承中的地位和作用。慧理初创灵隐寺后,規制初具,僧众无多。随着寺院的发展和地位的彰显,灵隐寺高僧迭出:永明大师延寿,“律虎”赞宁,“明教大师”契嵩,“明觉大师”重显,“佛海禅师”慧远,临济宗师具德,直至近、当代的巨赞、大悲等等,均为一代名僧大德。他们都曾住持灵隐寺,为灵隐寺的道业和建设做出过重要贡献。其中著名如法眼宗大师延寿(904—975年),俗姓王,余杭人,七岁诵《法华经》,年三十四舍俗出家,苦行自律,到天台山静修禅定,参谒法眼宗高僧德韶。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吴越忠懿王钱弘俶请他住持灵隐寺。他费尽心血,新建僧舍五百余间,石幢两座,又建百尺弥勒阁。延寿自我修行非常严格,世人视其为弥勒再世,上座弟子达两千余人。后住持净慈寺,对佛教各宗派教义集中梳理。他极力主张禅教并重,性相融合,征引大乘佛经120种,祖师语录120种,圣贤集60种,编成长达百卷的《宗镜录》。甫一面世,天下传诵,声播海内外。当时高丽国王读了《宗镜录》大为倾慕,特派遣僧人到净慈寺向延寿学习佛法,代以国王身份行弟子之礼,并赠送金线袈裟等法器。

灵隐寺不仅名僧迭出,而且在教义纷杂中包容兼蓄,不局限于一门一户。禅宗六祖慧能创顿悟之法后,经怀让、马祖传怀海,一花五叶,后续弟子开立了沩仰宗、曹洞宗、临济宗、云门宗和法眼宗五大支流,各大寺院难免各有所持。但灵隐寺却不囿于此,“南岳青原以后,五宗迭兴,而灵隐皆得而有之甚矣。……真观之为曹洞也,文喜之为沩仰也,延寿之为法眼也,契嵩之为云门也,瞎堂、佛智、密庵诸人之为临济也。五宗之圣贤,指不能屈,灵隐皆得而有之,则未有如灵隐之盛也。”(孙诒《灵隐遍五宗论》)南宋宁宗时品第全国禅院,灵隐寺被评定为禅院五山之二,是有它丰厚的禅学和名师作为基础的。高僧辈出,加之不囿门户,禅门大开,展现了灵隐寺恢弘的

气度。

中国佛教寺院地位的确立,通常与世俗政权的垂青有很大的关系。灵隐寺初创时香火不盛,到南北朝时期,因梁武帝大力推崇佛教,将佛教定为国教,江南出现建寺立院的热潮。依傍江南重地杭州的灵隐寺,第一次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关注。梁武帝赐田给灵隐寺,使寺院得到了很大的扩建。其后隋文帝一改北周武帝的废佛政策,在全国恢复对佛教的推崇。仁寿二年(公元602年),隋文帝派僧人慧诞法师到杭州弘扬佛法,又将抚养其长大的尼姑智仙安葬于灵隐寺前的飞来峰与莲花峰间,是为神尼舍利塔。唐时,全国佛教大兴,灵隐寺兴盛一时。唐武宗会昌年间灭佛,灵隐寺寺毁僧散。直到五代吴越王时期,灵隐寺终于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吴越立国,建都于杭州,杭州成了江南的政治经济中心。吴越武肃王钱镠虔敬佛,在杭州境内建寺150多个,塔幢数十座。其子嗣亦尊佛有加,特别是吴越忠懿王钱弘俶继位后,大兴灵隐寺,扩建其为九楼、十八阁、七十二殿,又请法眼宗高僧延寿住持灵隐寺。经几次扩建,灵隐寺殿宇房舍一千三百余间,僧众多达三千,赐名“新灵隐寺”,其声誉和规模为江南第一。吴越诸王造就了杭州东南佛国的声誉,也将灵隐寺推向了鼎盛时期。

吴越忠懿王纳土归宋,江南免于战火,灵隐寺的繁盛得以延续。北宋朝廷出于安抚江南的需要,依然对灵隐寺尊崇有加。宋真宗年间改灵隐寺为“灵隐山景德寺”,又赐名“景德灵隐禅寺”。仁宗年间,章懿太后赐脂粉钱九千五十四贯用于寺院修葺。后又将杭州、秀州两地良田13000亩赐予灵隐寺,以应寺僧施粥之需。除了其他一些恩赐,庆历年间,仁宗准韩琦、欧阳修奏,将住持灵隐寺的云门宗名僧契嵩所著《嘉佑集》和《辅教篇》入藏,赐契嵩“明教大师”称号。如此,灵隐寺名声大振,一时有天下禅宗圣地之象。南宋建都杭州后,高宗改灵隐寺为“灵隐寺崇恩显亲禅寺”,以彰显其孝道。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诏令每年四月初八佛诞日赐帛五十匹。乾道六年,孝宗赐灵隐寺住持慧远号“佛海禅师”。乾道八年,孝宗亲



临灵隐寺,宣慧远奏对,赐号“瞎堂禅师”,改法堂为“直指堂”,赐瞎堂禅师“直指堂”印。理宗时改大雄宝殿为“觉皇殿”,赐书“妙庄严城”。宁宗嘉定年间,评定灵隐寺为天下禅院第二。

有元一代崇奉喇嘛教,加上因特定的曾经作为敌对国南宋都城名寺的身份,元朝统治者虽然对灵隐寺也有一定关注,但力度毕竟有限。明太祖朱元璋定都金陵,诏天下举荐高僧。洪武十三年(1370年),太祖诏灵隐寺住持见心来复进京说法,封其为“十大高僧”之一,授以金襴袈裟,朝野轰动。后因胡惟庸案牵连,见心来复下狱被杀。从此,虽有各代住持努力整修,但灵隐寺已难有昔日盛况。万历十年(1583年)吏部尚书张瀚等命灵隐寺僧迎如通禅师住持,次年开始整治,五年后落成新殿,复改觉皇殿为“大雄宝殿”。明末清初,灵隐寺陷于破败衰落,且世俗味重,道风日下。住持豁堂禅

师举荐临济宗高僧具德和尚来灵隐寺。面对修缮所需巨量耗资,具德和尚力排众议,勤勉精进,从清顺治六年(1649年)起,用了18年的时间,将灵隐寺修复为拥有七殿、十二堂、四阁、三楼、三轩和五百罗汉堂等殿宇的大寺院。这次修复使灵隐寺法席一新,重振雄风,被尊奉为“东南第一山”。清廷为安抚江南,同时也为满足自己崇佛的需要,对灵隐寺给予高度关注。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康熙南巡驾幸灵隐寺,亲书“云林”,赐改



灵隐寺天王殿正门

1966年8月24日,浙江大学师生和灵隐寺僧将前来砸寺的红卫兵阻在门外,并与之展开大辩论,及时保护了寺院。

灵隐寺为“云林禅寺”。此后康熙三度亲临灵隐寺，均作诗纪行。乾隆帝尊崇祖制，在乾隆十六年（1751年），二十年，二十七年，三十年，四十五年，四十九年，先后六次驾幸灵隐寺，并作诗记游。此时的灵隐寺，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空前的恩幸，其在佛教界的地位甚为彰显。

特殊的地理环境、对佛学传承的贡献和历代统治者的高度关注，造就了灵隐寺的地位和声誉。历史上的灵隐寺不仅名播海内，在东南亚一带亦广有名望。特别是南宋建都杭州后，海外留学僧人，纷纷到江南求法。当时杭州的径山寺、灵隐寺、净慈寺，都是众僧向往之地。其中径山寺名望最高，是日本僧人集中学习的寺院。净慈寺因为延寿大师延续的名望，成为高丽僧人的集中地。而灵隐寺亦有许多日本僧人留驻。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年），日本高僧觉阿与徒弟金庆渡海来到杭州，参拜灵隐寺住持瞎堂慧远禅师。觉阿对慧远的佛学深表钦佩，但一时未能参悟。后与徒弟在江边闻如鼓涛声而大悟，返回灵隐寺向慧远讲述心得，述投机五偈。慧远认为觉阿已通禅理。觉阿于是在灵隐寺研究经义达四年之久。其后，日本僧人到灵隐寺学法的还有定心、圆尔辨圆、无关普门、寒岩义伊、约翁德俭等，他们后来都成为日本的著名僧人。淳熙十四年（1187年），日僧荣西来灵隐寺参拜，在南宋江南各大寺院学禅三年有余，回国后大力推广禅宗和茶道，对日本禅宗和茶道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在促进中日文化交流和佛教东传日本方面，灵隐寺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也因此东南亚一带赢得了声誉。

从隋唐开始，灵隐、天竺一带就是杭州官府、百姓礼佛、游览的首选。南宋时，宋高宗就经常去灵隐游玩，游玩仍嫌不足，下令在宫内开掘大水池，引水灌注以仿冷泉之水，又叠砌假山称为飞来峰。达官贵人在重要的节庆日前往灵隐、天竺祈福，设场做法事。历史上文人墨客对灵隐流连忘返，白居易对灵隐和冷泉亭的赞许是众所周知的，苏东坡则干脆常常离开衙门到灵隐，在冷泉亭阅文办公，并喜欢在寺院寄宿，和住持谈佛论禅。至于市民百姓前往游览



冷泉亭

1966年8月27日傍晚,杭州市政府主要领导在此向保寺和毁寺的两派群众传达周恩来总理关于保护灵隐寺的指示。

闹场景,都有描绘。不仅如此,灵隐、天竺等寺院还成了杭州官员和百姓的心灵寄托,遇到天旱不雨,官府或者百姓会到灵隐、天竺进香求雨。官员会因为宦海沉浮,百姓会因个人愁绪,到寺院烧香祈福。南宋末年的咸淳三年(1267年),元军进犯襄阳,江南告急,当朝宰相贾似道在三个月的时间里,竟然三次到灵隐寺、天竺祈祷,以求菩萨保佑,其对灵隐寺、天竺寺的心理依赖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明朝末年清兵大举南下,民族矛盾尖锐,江南一带人民转而寄恨于征服南宋的元朝,对作恶多端的元朝江南僧统杨珪真伽在飞来峰上留下的石刻造像发泄不满。当时著名的文学家张岱在游览灵隐寺时,把一尊蓄胡坐在龙身上,旁侧有侍女奉献花果,题记为杨连真伽镌刻的石像予以砸毁,并丢于茅厕之中。灵隐寺僧们纷纷责怪张岱的行为,但听说砸的是杨连真伽石像时,大家都表示赞同。《西湖游览志》的作者田汝成和当时的郡守陈仕贤,也都宣称自己砸碎过杨连真伽的石像。而普通百姓在灵隐寺礼佛游览时,常把位于飞来峰下方石龛中那尊豹头环眼的多闻天王像当作杨连真伽石像,或用木棍敲击,或用石块投掷,以宣泄义愤。灵隐寺僧人

和烧香,也逐渐演变成了杭州的习俗,遇有节庆,灵隐一地通常游人如织,这个习俗一直延续不衰。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留有关于游览灵隐的记载;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对灵隐寺一地善男信女结队进香,穿戴华丽的妇女接踵现眼的热闹

不便劝阻,只好用铁蒺藜将多闻天王佛像蒙围起来。

由此可见,灵隐寺在江南佛教寺院中一直占据着数一数二的地位,具有相当的海外影响,是著名的名胜古迹,我国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灵隐寺与杭州这个城市有着一种难解难分的联系,在杭州市民心目中有着非常特殊的地位。杭州市民对灵隐寺赋予了很深的情感,在杭州人看来,杭州如果没有灵隐寺,就如同没有西湖一样不可思议。唯其如此,在1949年5月杭州解放,而紧接着7月灵隐寺大殿倾毁后,杭州城区一度人心浮动,传言四起,现在高龄的杭州人都还记得当时传言纷纷的情景。



二、重修大雄宝殿

灵隐寺大雄宝殿的倒塌,在当时的杭州是一件大事。佛教界人士、各方有识之士和杭州市民都希望能尽快修复灵隐寺。解放初举行的杭州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浙江省第一届第二次各



沙孟海重题的匾额

灵隐寺大雄宝殿的匾额,由著名书法家沙孟海先生在解放后重修灵隐寺时题写,后遭涂改。周总理亲自干预此事。1987年,沙孟海先生重题此匾。



界人民代表会议,都提出了募款兴修灵隐寺大殿的建议。时任灵隐寺方丈的弘妙,向杭州市人民政府提出申请,希望募款重修灵隐寺大殿。

浙江省和杭州市人民政府从成立起,就着力保护杭州西湖风景区,早在1950年4月25日就颁布了《西湖风景区管理条例》,并且在同年的5月起开始疏浚西湖,整治苏堤和白堤。政府亦深知灵隐寺在佛教界的地位和影响,体察杭州市民对灵隐寺的情感牵连,充分了解重修灵隐寺不仅可以保存文化遗产,而且对安抚教徒和市民的情绪,宣传党的宗教政策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也希望能重修灵隐寺。当时人民政权刚刚建立,工作千头万绪,财力亦不充盈。尽管如此,浙江省和杭州市两级人民政府,对重修灵隐寺一事还是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多次召集佛教界人士、社会贤达名流及各方人士,共同商议重修事宜。1952年4月18日,由浙江省民政厅牵头,在杭州市民政局召开了首次灵隐寺大雄宝殿修复委员会筹备会议。会议邀请各界人士参加,由浙江省民政厅厅长刘建中主持。此次会议宣布组建杭州市灵隐寺大雄宝殿修复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会推选杜伟为主任委员,与包括赵朴初、巨赞在内的副主任委员六人,委员有各界名流和相关领导24人。5月3日,委员会在灵隐寺开始挂牌办公。5月9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组织简则》,对委员会的名称、组织机构做了规定,明确委员会的任务是:“本会为保护祖国文物艺术及名胜古迹,在市人民政府领导下,负责主持杭州灵隐寺大雄宝殿的修复重建事宜。”

委员会前后召开多次会议,就如何修复灵隐寺大雄宝殿的具体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归纳集中后,大家认为主要有两大问题需要解决:一是修复经费的来源问题。经过初步匡算,总体重修资金包括材料和人工需上百万,省市政府没有如此的财力,财政部门没有这样的预算。佛教界人士提出向兄弟寺院如上海玉佛寺、龙华寺、天台国清寺、宁波阿育王寺、天童寺、奉化雪窦寺募化。但是由于解放以后佛事活动的减少,这些寺院的经济状况也不理想,不可